

印刷单位：湛江南华印务公司

开 本：889×1194 毫米 1/16 开

印刷字数：27 印张 973 千字

印刷时间：2007 年 11 月

准 印 证：(2007) 湛印准字第 093 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序 言

“学术是根本”是我校的办学理念。围绕这一理念，近年来，我校从制度着手，通过加强学术方面的制度建设，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发展环境：通过对《湛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修订，增加了科研参与学校“一体化全员育人”体系建设的规定，让更多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还有学生都有参加项目研究的机会，极大增强了教师和学生们的学术意识和学术兴趣，通过对《湛江师范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修订，使得奖励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够更公平和合理，以最大限度激发教师们的学术积极性；通过对《湛江师范学院重点学科管理办法》的修订，规范了学校的学术发展方向，让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而《湛江师范学院举办学术会议管理办法》的出台，则让学校的学术交流更加活跃和开放……。

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有利的贯彻推行让我校的学术发展日益蓬勃，成效也是显著的，单学术论文一项，2004年到2006年，累计发表学术论文近2500篇，年均论文发表数超过800篇。相对于2004年以前的年均500多篇，在数量上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而质量上的提高也是明显的，发表在核心刊物的论文比例从2004年前的25%提高到了35%；三年内被三大索引收录的论文有89篇，年均近30篇，比2004年前的每年不到20篇增加了三分之一。

对学术的重视使我校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基此，我们编印了这部《2004——2006湛江师范学院优秀学术文集》(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版)。这部文集，共收录了我校教师从2004年到2006年发表的部分优秀论文78篇，其中社会科学类论文92篇，自然科学类论文86篇；收录的原则是：科学类论文为权威A或权威B级别，自然科学类论文为权威A级别。这本汇编，可以看做是对我的过去，学不成果的一个总结，同时更是对未来的一个激励，鞭策更多的湛师人如书中作者一样，兢兢业业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出高水平的成果。

编 者

2007年10月

目 录

中国语言文学

汉字起源年代推论 (《古汉语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马显彬 (3)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李贽的自然观 (《民族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赵志军 (6)
李贽“童心说”多元文化渊源试探 (《民族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李珣平 (9)
《汉语大字典》单字释义小议 (《语文研究》 2004 年第 4 期)	朱 城 (13)
出土文献“是是”连用后一“是”字的训释问题 (《古汉语研究》 2004 年第 4 期)	朱 城 (16)
诗歌与绘画关系新探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4 年第 4 期)	张冠印 (20)
驴形象的演变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国外文学》 2005 年第 3 期)	张应斌 (24)
从“旧时正话”看明代官话 (《语文研究》 2005 年第 1 期)	陈云龙 (31)
广东电白观珠客家话止摄精组字的读音 (《语言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陈云龙 (36)
福楼拜“非个人化”原则的哲学基础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1 期)	王钦峰 (39)
《太平经》中表顺承关系的“反” (《语文研究》 2005 年第 1 期)	葛佳才 (44)
汉字性质新论 (《语言研究》 2005 年第 2 期)	马显彬 (49)
汉语同音现象分析 (《语文研究》 2005 年第 2 期)	马显彬 (52)
“桥”的意象与京派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第 5 期)	阎开振 (57)
试论禅宗修辞的机趣性原则 (《语文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疏志强 (69)
评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 (《文学评论》 2005 年第 4 期)	李珣平 (72)
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的启示和构想 (《文艺理论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林衡勋 (76)
论汉语合成词的形成与词义衍变 (《语文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方平权 (81)
当代代言式述学中的“我们” (《文艺研究》 2005 年第 10 期)	杨 颢 (85)
论作为当代个人独立文论述学人称的“我们” (《文艺理论研究》 2005 年第 5 期)	杨 颢 (87)
“中国美学的地方经验与世界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艺研究》 2005 年第 8 期)	熊家良 (96)
论体用引申 (《语文研究》 2006 年第 2 期)	方平权 (100)

王夫之的《说文广义》（《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	方平权（106）
中国新诗民间化运动论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	赵金钟（113）
福楼拜与空想社会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5期）	王钦峰（117）
对疑问副词“亦”东汉消亡说的一点补充（《中国语文》2006年第1期）	葛佳才（121）
《论衡》中的恰幸副词（《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	葛佳才（126）
《孔雀东南飞》母题及动物原型（《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张应斌（130）
大型字典单字释义问题再议（《语言研究》2006年第1期）	朱 城（134）

新闻传播学

新闻发布制度化构建中的立法问题——中西信息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比较研究

（《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胡华涛（141）
------------------------	----------

教育学

师范院校的学科拓展与国际交流合作（《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第23期）	郭泽深（149）
论教育论文评价的标准（《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1期）	李 方（151）
后现代教学理念探微（《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	李 方（153）
论英国中小学课程改革与发展（《外国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	白彦茹（159）
论课程文化发展的客观标准（《教育研究》2004年第6期）	范兆雄（163）
外语学习策略运用中的元认知因素（《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	黄巧云（168）
论美国课程研究方法的主流取向（《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7期）	范兆雄（170）
美国高中百年课程发展述评（《课程教材教法》2004年第10期）	程可拉（176）
美国高中课程百年发展轨迹的原因分析及启示 （《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	程可拉（181）
海峡两岸师范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刘晓玲（187）
新课程实施与高师教育类课程变革（《课程教材教法》2005年第6期）	李 方（189）

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 (《课程教材教法》 2005 年第 5 期)	刘海涛 (195)
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思考——基于 21 世纪人类学习革命的背景 (《中国教育学刊》 2006 年第 2 期)	程可拉 (199)
自组织教育与他组织教育的理论差异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6 年第 2 期)	卢建筠 (203)
乐学——文言文教学改革使命——语文课程改革下的文言文教学策略 (《中国教育学刊》 2006 年第 4 期)	周立群 (206)
外语学习的三对基本概念辨析 (《课程教材教法》 2006 年第 6 期)	程可拉 (211)

心 理 学

中小学教师知识观与教学观研究 (《心理科学》 2004 年第 2 期)	左银舫 (217)
认知风格对不同类型几何问题解决的影响 (《心理科学》 2005 年第 4 期)	左银舫 (219)
刺激范畴的激活与抑制对预搜索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06 年第 2 期)	雷学军 (221)
预搜索过滤分心物的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年第 2 期)	雷学军 (232)
不同文化语境与难度下第二语言阅读的眼动追踪研究 (《心理科学》 2006 年第 6 期)	左银舫 (238)

哲 学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探析 (《哲学动态》 2004 年第 9 期)	刘明贤 (245)
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进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年第 12 期)	龙 翔 (249)

历 史 学

论荀悦的历史认识论 (《史学月刊》 2005 年第 2 期)	庞天佑 (257)
荀悦考察历史的方法 (《史学史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庞天佑 (264)
庚子年清政府对外“宣战”说质疑 (《史学月刊》 2006 年第 1 期)	郭天祥 (272)
“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世界历史》 2006 年第 2 期)	王慧英 (274)

政治学

- 权利保护失衡与新农村建设的价值取向 (《政治学研究》 2006 年第 3 期) 张西京 (287)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权利保护问题探析
-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 年第 4 期) 张西京 (294)
- 认同与拒斥——从政治合法性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当代重建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 年第 4 期) 袁 铎 (298)

法 学

- 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论 (《现代法学》 2006 年第 6 期) 杨三正 (305)

外国语言文学

- 翻译理论教学的几个认识问题 (《国外外语教学》 2004 年第 1 期) 刘传珠 (313)
- 《语际语用学中的习得研究——在国外学习环境中学习如何以言行事》评价
- (《现代外语》 2004 年第 4 期) 徐学平 (318)

地 理 学

- 历史文化古城的非利用价值评估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 (《经济地理》 2005 年第 2 期) 许抄军 (325)
- 历史文化古城游憩利用价值评估——以凤凰古城为例
- (《经济地理》 2006 年第 3 期) 许抄军 (329)

艺术学

让水彩画有得写——中国水彩画现状之浅见（《中国水彩》2004年第25期）·····	张守武（337）
吴道子的“莼菜条”辩（《美术观察》2004年第9期）·····	张冠印（342）
林风眠与国立艺术院的创建（《美术观察》2004年第7期）·····	彭飞（344）
林风眠与徐悲鸿关系考（《美术研究》2004年第4期）·····	彭飞（347）
材料与装饰艺术（《装饰》2004年第10期）·····	袁浩鑫（350）
关注“书写状态”重估古代书迹的艺术价值（《中国书法》2005年第8期）·····	刘宝光（352）
论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特征（《装饰》2005年第6期）·····	袁浩鑫（355）
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当代中国画的激活之摭谈（《美术》2005年第2期）·····	金长安（356）
徐渭“舍形而悦影”说刍议（《美术观察》2005年第9期）·····	王黎明（359）
精神享受和物化愉悦——让书籍设计贴近读者心灵（《美术研究》2005年第4期）··	姚雪凌（360）
试论徐渭及其绘画对后世的影响（《国画家》2006年第4期）·····	王黎明（362）
战国时期楚漆凤鸟纹饰探议（《装饰》2006年第8期）·····	王黎明（365）
论唐宋科举制度对书法的影响（《美术观察》2006年第6期）·····	杨军（367）
《以一摄万 万象归一》——试论石涛“一画说”的成因 （《美术观察》2006年第1期）·····	金长安（368）
新石器时代原始陶器的造型（《装饰》2006年第1期）·····	袁浩鑫（369）
课程理论与20世纪实践中的音乐课程“范例”（《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3期）·····	蔡觉民（371）
岁月如歌——庆杨鸿年教授从教五十周年（《人民音乐》2004年第8期）·····	张彬（377）
杨鸿年《中外童声合唱精品曲选》的艺术品位及学术价值 （《人民音乐》2005年第8期）·····	张彬（382）

图书情报学

创造读者：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提升（《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2期）·····	陈小勉（387）
中美高校图书馆网上服务比较研究（《情报资料工作》2005年第4期）·····	黄慧薇（390）

Linux 环境下对 VPN 用户认证的 Radius 服务器的设计与实现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5 年第 7 期) 黄继征 (395)

Linux 环境下基于 PPTP 的虚拟专用网技术的实现及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5 年第 8 期) 黄继征 (399)

基于 Linux 系统的透明代理服务器的构建及在图书馆局域网中的应用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5 年第 2 期) 曾湛伟 (403)

中外大学图书馆教学支持服务创新比较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2006 年第 7 期) ... 黄慧薇 (407)

用户信息时态数据库系统分析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6 年第 4 期) 赖益雯 (411)

图书馆治理的制度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图书情报工作》 2006 年第 7 期) 习卫妮 (414)

图书馆网站系统安全测试刍议 (《图书情报工作》 2006 年第 6 期) 郑 定 (417)

中国语言文学

汉字起源年代推论

马显彬

(湛江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对汉字起源年代的研究一直没有取得进展,本文提出了根据汉字的增长率来推算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并将比较系统成熟的汉字起源年代推前到公元前3300年左右。

[关键词]汉字;增长率;年代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4)03-0067-03

一般都把甲骨文的时间作为汉字起源时间的下限。对于上限,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它定在仰韶文化等陶器上的陶符。郭沫若先生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1][p3]}于省吾先生不仅认为它们是原始文字,而且还直接把它们与商周古文字相比附,例如释“𠂔”为矛,“𠂔”为五,“𠂔”为示等。他说:“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2][p2]}有的认为陶符跟甲骨文不是一个系统,不是汉字的前身,不能确定汉字起源时间的上限。裘锡圭先生指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陶符没有用于记录语言的证据,“这种符号所表示的决不会是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不要说早期汉字,就连原始文字的可能性也非常小。^{[3][p23]}高明先生在他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说,“陶符出现的时代虽比汉字早,但看不出有什么发展,直到战国时期仍然停留在原始形状。汉字则不然,出生的时代虽比它晚,……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字数已达四千以上。尤其到春秋战国时代,《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均已用汉字写成。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集秦篆已达9353字,二倍于商。从而可明显看出,陶符同汉字不是同一体系。”^{[4][p31]}仰韶文化等陶器上发现的陶符是不是文字,至今未有定论。

我们能见到的系统成熟的汉字材料只有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至1100年左右。殷商甲骨文已经是相当系统成熟的文字,把它作为早期汉字起源的时间是不恰当的。汉字在殷商甲骨文之前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之前肯定还有比较系统成熟的早期汉字,只是没有发现这些材料,或者这些材料没有保存下来。对此,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材料,所以,没有人轻易地把汉字起源的年代往前推移,更不知道推到何时为止。也正因为如此,对汉字起源年代的研究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汉字起源的上限难以从实际上确定下来。现在能够提出的根据,最远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文以及时间与此相近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可以暂时把这一时期作为汉字起源的上限。从理论上说,汉字起源的上限也许比这还要早些,那要等发现新的考古证明时再向上推移了。”^{[5][p8]}如果一定要等到找到早期汉字的材料,才来确定汉字的起源时间,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早期汉字的材料可能永远找不到。所以,有必要调整研究的思路,从别的途径去寻求突破口。我们认为可以根据汉字的增长规律来推算汉字起源的时间。汉字是在生活中逐渐产生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突然冒出几千个汉字来。汉字的增加也是有一定规律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根据文字的这一发展规律,设法计算出汉字的增长率,然后再根据汉字增长率推算出早期汉字的形成时间。通过推算发现新的事物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845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亚当斯算出了海王星的轨道和质量,但没有被重视。直到1846年9月18日,勒威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寄给柏林天文台的伽勒,并在预言的位置附近找到了这颗行星,于是,这颗笔尖上发现的行星被命名为海王星(Neptune)。我们认为,通过推算来解决早期汉字的形成时间也是可行的。

判断汉字的起源问题,不能以零星的少量的汉字为依据,而要以适量的比较系统成熟的汉字为依据。如果我们要去确定第一个汉字是何时产生的,那就非常困难,也没有必要,而且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适量的比较系统成熟的汉字的最低限量是多少呢?据说“圣书字”有 2000 来个,经常用的却只有 700 至 800 字。^{[6][96]}根据现代字频研究的成果,1000 字的覆盖率已经很高了。国家语委和国家标准局《现代汉语字频统计表》中 1000 个汉字的覆盖率达到 89.12%,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汉字频率表》中 1000 个汉字的覆盖率达到 91.37%,二者平均已达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1000 个左右的文字符号,基本上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可以作为适量的比较系统成熟的汉字的最低限量。所以,我们把这 1000 个左右的汉字形成的时间作为早期汉字形成的时间。

历代有不少的字书,主要字书的收字情况列表如下:

时间	作者	书名	字量	增字量
东汉(100 年)	许慎	说文解字	9353	0
南朝·梁(543 年)	顾野王	玉篇	22726	13373
宋代(1008 年)	陈彭年等	广韵	26194	3468
明代(1615 年)	梅膺祚	字汇	33179	6985
清代(1716 年)	张玉书等	康熙字典	47035	13856
1968 年	辞典编委会	中文大辞典	49905	2870
1990 年	徐中舒等	汉语大字典	54678	4773
1994 年	冷玉龙等	中华字海	85568	30890

说明:数据来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和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

由上可见,汉字是从少到多逐渐增加的。但是,正如裘锡圭先生指出的那样,新字不断产生的同时,旧字也在不断的合并或被淘汰。汉字的增长不是无限的,到一定阶段后,汉字的字量将相对稳定下来。随着汉字的增加,异体字的数量也在增加,汉字数量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异体字的增加。不计异体字,汉字的增加没有那么多。不同的字典都不同程度地收录了一些异体字,异体字在各字典中的比例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对这种比例的研究很少,只有郑林曦先生对《康熙字典》的异体字作过研究,据他的统计,《康熙字典》异体字有 9329 组,共两万多字,占 40%。^{[7][93]}异体字不是新增字,不能作为推算的依据。所以,我们以甲骨文、《说文解字》的篆文和《康熙字典》非异体字为依据来推算。根据孙海波《甲骨文编》的统计,不计异体字,甲骨文不同的单字共有 4672 个,《说文解字》有篆文 9353 个,古籀异体重文 1163 个,《康熙字典》异体字占 40%,18814 字,非异体字占 60%,28221 字。依据的字量为:甲骨文,4672 字;《说文解字》,9353 字;《康熙字典》,28221 字。具体推算方法如下:

计算出每年的年均汉字增长字量,然后乘以 1000,得出每千年的汉字增长量,千年汉字增长量再加上前一阶段的汉字量,得到 1000 年后应达到的汉字千年总量,然后将汉字千年总量除以前一阶段的汉字量,得到千年汉字增长率(倍数),然后再用来反推甲骨文之前的早期汉字的时间。

各种数据列表如下:

种类	字量	时间	前后字数差额	前后时间差额	年均增字量	千年总字量	千年增长率
甲骨文	4672	- 1300	—	—	—	—	—
说文	9353	100	4681	1400	3.344	8016	1.72(倍)
康熙字典	28221	1716	18868	1616	11.676	21029	2.25(倍)

说明:殷商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1400 年至 1100 年左右,甲骨文的时间我们设定为公元前 1300 年。

将两个千年汉字增长率 1.72 和 2.25 相加,除以 2,得到千年汉字平均增长率 1.99。以甲骨文为基础,可以推算出甲骨文之前的早期汉字每千年前的汉字总量。其结果如下:

时间(公元前)	- 1300	- 2300	- 3300	- 4300	- 5300	- 6300
字量	4672	2348	1180	593	298	150

可见,早期汉字在公元前 3300 年左右基本上就达到了 1000 字左右,也就是说比较系统成熟的早期汉字至少产生于公元前 3300 年左右,原始汉字估计起源于公元前 5000 - 6000 年左右。这段时间正是氏族社会时期。约公元前 16000 年前山顶洞人开始氏族公社的生活,约公元前 4000 - 5000 年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约公元前 2000 - 3000 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约公元前 2000 多年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氏族公社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时期。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是中国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属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同一氏族的成员都是亲属,由共同的祖先繁

衍下来。一个氏族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过着集体的生活,共同向大自然作斗争。这时已经具备了文字产生的社会条件,“经济发展,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渐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字不得不发展起来。”^{[5][p6]} 汉字不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是氏族社会的产物。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我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汉字主要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这一结论可以从考古方面得到印证。1983—1987 年在对河南省中部舞阳县城北的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在若干墓葬随葬的龟甲、骨器和石器上也发现了契刻符号。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5000—6000 年,比仰韶文化等的时间还早。而其中的一些符号,例如、,与甲骨文“目、日”的字形很接近,与仰韶文化等陶器上的刻符不是一个系统。按照推论,这段时间汉字已经有一、二百字左右,与我们的推论相吻合。《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史记》中《股本纪》的世系除个别地方有误外,与甲骨文反映的世系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夏本纪》的世系记载也是可信的,司马迁依据的材料必然是书面材料,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禹形成于公元前 2070 年,夏代初期至西汉,相距 2000 年左右,口头材料相传,不可能有如此精确的世系记载。所以,詹鄞鑫先生认为夏代先人也必然“有册有典”,汉字在夏代之初就已经存在了。^{[8][p30]} 这一论断与我们的推论相吻合,在这个时期,根据推算汉字已经有两千多字。

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钉头字”成熟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周有光先生以甲骨文为标准,认为中国文字产生比西亚和北非晚 2000 年。埃及“圣书字”只有 2000 来个字符,两河流域的“钉头字”也只有 2000 来个字符。^{[6][p61][p65]} 殷商甲骨文已是相当系统成熟的文字了,怎么能把字量已达到 4672 个的殷商甲骨文同只有 2000 来个字符的“圣书字”和“钉头字”相比而得出汉字比“圣书字”“钉头字”晚 2000 年左右的结论呢? 比较必须建立在相同的前提下,都应该以 2000 字符相比较。“钉头字”的性质同汉字差不多,按照我们的推论,公元前 3300 年左右,汉字也有 1200 字左右,同它们的差距并不大,至少晚不了多少(没有 2000 年的差距)。

最后谈谈“仓颉”造字的问题。“仓颉”造字的传说主要见于《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禹是黄帝的 7 世孙,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禹形成于公元前 2070 年,按照每世 30 年计算,黄帝到禹约 210 年,因此,黄帝、“仓颉”大约生活于公元前 2280 年左右。既然比较系统成熟的汉字产生于公元前 3300 年左右,公元前 2280 年,汉字已经达到 2 千多字,所以“仓颉”独创汉字的说法不成立,不过对汉字进行规范整理是可能的。我们认为“仓颉”确有其人。

参考文献:

- [1] 郭沫若. 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J]. 考古学报, 1972, (1).
- [2] 于省吾. 关于古代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J]. 文物, 1973, (2).
- [3]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4] 高明.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5] 何九盈, 胡双宝, 张猛.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6] 安家瑗, 安家瑶. 世界古代前期科技史[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 [7] 郑林曦. 精简汉字字数的理论和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8] 詹鄞鑫. 汉字说略[M]. 辽宁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On the Times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MA Xian bin

(Chinese Department,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The time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not solved, the thesis puts forward a method to research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basis of the growth rate of character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origin of the mature characters is about 3,300 B.C.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growth rate; times

[作者简介] 马显彬(1963-),男,重庆璧山人,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字学研究。

[责任编辑:舟人]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李贽的自然观

赵志军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均以自然作为论证自己设定的文化价值和理想合理性的最后根据,因此,各种文化都对自然做出过符合自身文化宗旨的解释。道家文化以虚静恬淡无为为自然,属于天地境界;儒家文化以道德为自然,既有天地境界,又有自然境界;李贽所属的世俗文化则以感性欲望为自然,属于自然境界。几种自然观虽相互联系但又不尽相同,造成一种思想张力。

关键词:李贽 世俗文化 自然

作者单位: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梁治平在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时曾明确指出,自然“不但是道家的学说,也是儒家和法家据以塑造其理想的思想背景。”^①“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礼、法及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归根于‘自然’。”^②这意味着,自然是作为中国古代各种文化的理想而成为其论证文化价值合理性的最后根据。作为文化理想,自然最基本的内涵是建立在内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自由。在中国古代,自然大多取《老子》和《庄子》的内涵。此内涵学术界多数学者(胡适、陈鼓应、徐复观等)都解释为“自己如此”。就自然是出于“自己内在本性、自身如此”而言,这一范畴实际上内蕴着“自由”的内涵。如果就自然的最基本内涵——自己如此、自由——而言,其涵义是确定的。然而,由于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态都各道其道,以论证自己文化价值和理想的终极根据以及合法、合理性,所以,自然作为一个范畴,已悄悄地被改造、利用。对于什么是自己如此?什么是自由?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答案,由此造成了多元的自然观。这样,对李贽自然观的考察,就必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才能发现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自然作为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论证其文化价值和理想的合理性的最后根据,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人格理想,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审美理想。受这一传统的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的影响,李贽论人力主自然,提倡自然真道学:“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③论文亦力主自然:“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

牵合矫强而致乎?”^④显然,在李贽那里,自然就是情性自然,而情性自然就是童心的自然流露。关于童心,李贽是这样界定的:“夫童心者,真心也。”^⑤然而,什么叫真心呢?这得从人心说起,关于人心,李贽是这样界定的:“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⑥也就是说,人心就是私心,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个人私欲的满足,就算圣如孔子也是如此。因此,李贽对于人的行为出于为公的动机的说法总是不相信,认为为自己谋私利才是真实,才是自然,为他人谋利则是虚假,不自然。由此可知,李贽的真心其实就是人的私欲,是私欲的自然的赤裸裸的表露和满足。据说,李贽甚至公开说:“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⑦

李贽的自然与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自然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能力有限,满足人的自然欲望的物质资源相对有限,因而必然对之采取控制和超越的态度。这在政府的政策上就是重农抑商,使相对有限的物质资源较少有机会聚集起来,刺激人的物欲,从而使处于相对纯朴节俭的状态。与此相适应,各种文化也通过各种策略来抑制和超越种种逸出社会基本满足水平的物欲。在这方面,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一样的。它们的分歧只表现在用什么方式来抑制和超越人的欲望而已。儒家人伦道德来抑制和超越人的欲

望,而所谓道德,也就是礼,其实质就是调和人的无限欲望和有限的欲望对象的矛盾,使天下不争,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故礼者,养也”^⑥。礼的作用,其实质就是一种在物欲对象相对匮乏的时代维护统治者优先占有欲望对象的权利,这从荀子百般为王公奢侈淫逸生活的辩护中即可看出。由于识破了儒家道德的虚伪本质,道家采用非功利的审美理性和智慧来抑制和超越人的欲望。

在道家那里,道和自然同义。这就是说,人性的虚静恬淡无为,实际上就是人性不受性份之外的欲望追求所引诱,不受知识的是非判断所吸引,不为主观情感好恶及道德的善恶判断所困扰的一种平静状态,是心灵不为任何知识、意念和感情欲望所束缚的一种逍遥自由境界。在道家那里,自然(自由)并不是指人的内在自然(人的自然本能),而是指道的自然,是通过道的自然来超越人的自然本能,因而它最终必然走向“以天合天”,走向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它的自然属于天地境界中的自然,而不是自然境界中的自然。

与道家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理想设定在人性中虚静恬淡无为维面,并将虚静恬淡无为等同于自然不同,儒家则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理想设定在人性中的道德维面,企图在人类理想的道德关系中获得自由,建立名教乐园。然而,体现儒家文化价值和理想的周文化在春秋时代已日益暴露出明显的人为性和任意性,不再是不证自明和天然合理的了。由于其合法、合理性的存在岌岌可危,就需要对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理想进行新的论证,以寻求一个坚实的基础。儒家对已经挂空了的周文化的合法、合理性论证分别从内外两条路径进行。由内在路径,儒家认为,体现人的道德本性的周文化植根于人的基于天然血缘基础之上的亲情,人的道德本性是人生而有之的、天然的,是出于人的内在本性的自由意志,即,它出于自然,又合乎自然。与内在路径不同,儒家的外向路径主要表现为,向外寻求体现道德本性的周文化的天然(合法合理性)基础,以宇宙万物的天然性、不证自明性来论证周文化及其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理想的天然性、不证自明性。在外向路径中,儒家先将自己所设定的人类道德及礼乐制度赋予天,然后利用天的天然性和不证自明性来论证人类道德及相关的礼乐制度的天然性和不证自明性,进而使人类道德和相关的礼乐制度从表面看来也出于自然,又合乎自然。经由外向自然化的路径,儒家也追

求天人合一式的天地境界。儒家的内在路径有条件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即“发乎情,止乎礼义”——其中既有自然境界中的人的自然本性,又有道德境界中的道德约束;而外在路径则走向天人合一式的天地境界。因此,儒家自然观的内在形式是通过宇宙智慧和人间伦理以超越人的自然本性和自我中心,而外表形式则是宇宙天地的自然无为。

李贽自然观的背景是伊斯兰教的重商主义和近代城市所产生的世俗文化。李贽七世祖林駉是泉州的大商人,娶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女为妻。从七世祖起,一直到他的曾祖父一代,其家族均以经商为主,与伊斯兰教信仰者来往密切。虽然李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长大的,也从不提及家族的宗教文化背景,但这种家族的宗教文化背景不可能不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这一家族及其宗教文化背景,使他对商人充满同情,并为他们辩护。商业从本质上说就是商人通过不断地制造和扩张人的物欲而达到盈利的目的。因此,伊斯兰教的重商主义和家族历史上的经商传统对李贽这种重欲望的自然观肯定产生过某种虽难以证实但确实存在的影响。

李贽自然观的直接现实文化基础是明代工商城市所产生的世俗文化。世俗文化的文化价值和理想设定在人性中感性欲望这一维面上。它以感性欲望为人的自然本性,以感性欲望的充分满足和自由表现为理想。因此,它只有内在肯定的维面,没有外在超越的维面。这种以弘扬个人感情欲望(尤其是私欲)为目的的自然观的现实基础,就是明中叶的工商城市。一般来说,工商城市既是制造欲望对象的空间,又是聚集欲望对象的空间。工商城市充满了丰富的欲望资源,不仅刺激、制造和扩张人的欲望,而且也有能力满足人的各种欲望。按照荀子“礼者,养也”的说法,礼无非是为调和有限的物质财富和人的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而制定的,其目的是养人之欲,使天下不争。现在,既然丰富的物质财富能满足人对欲望的进一步要求,传统的对人的欲望的较为严厉的礼的限定,也就不再为人所遵从了。于是,个人欲望的无限制的自由满足就成了市民尤其是商人和手工业主的首要追逐目标。在市民社会中,谁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欲望满足,谁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这从当时工商城市直接孵化的市民文艺即可看出。在《金瓶梅》中,作为药材商人的西门庆由于财富、女人、权力等方面欲望能得到极大满足而被礼遇,因而

成为工商城市的英雄。工商城市中商人和手工业主对欲望的无止境追求,影响着整个城市。市民奢侈成风,连文人和一般老百姓也不例外。

李贽的自然观和儒家文化及道家文化的自然观有明显的区别。儒家的自然观虽然也肯定人的感性欲望,却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符合仁义礼智等道德设定,发乎情,止乎礼义。而且,儒家文化中除了内在肯定人的感性欲望维面之外,还有外在超越感性欲望的天地境界。道家文化的自然观虽然不否认人的基本欲望,但主要是处于超越感官欲望的形而上的心灵自由的维面。因此,无论是儒家文化的天地境界中的自然还是道家文化中的自然,都强调为人和为文的虚静,对身体及其欲望都采取了一种非功利的距离态度,在人格境界和文艺境界上都含有超越感官欲望的“淡”的内涵。老庄讲淡,宋儒如朱熹等亦讲淡。世俗文化的自然观由于强调感性欲望,因而也就没有超越感官的淡的这一内涵。所以,李贽认为:“淡则无味”^⑨。他强调的是感情的强度与浓度,强调“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⑩这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及其欲望的非距离的、功利性的身体宣泄,典型地体现了世俗文化狂欢化、感官化、欲望

化的色彩。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几种主要文化的自然观各具特色,构成了一种必要的思想张力。道家文化自然观注重超越的形而上的心灵自由维面,世俗文化自然观注重内在的无条件地肯定感性欲望的形而下的感性维面,而只有儒家文化自然观既包含内在地肯定人的感性的维面,又包含外在的超越的形而上的维面,是一种中庸状态。就此而言,以李贽为代表的世俗文化自然观更接近儒家文化而不是道家文化,说以李贽为代表的世俗文化自然观来自道家显然是一种皮相之见。

注释:

- ①②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326页,第3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版。
- ③ 《李贽文集》第5卷《初潭集》,第20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④⑤⑨⑩ 《李贽文集》第1卷《焚书》,第123页,第92页,第123页,第9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⑥ 《李贽文集》第3卷《藏书》(下),第6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⑦ 周应宾:《识小录》,转引自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第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 ⑧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53页,岳麓书社1996年版。